

山东隋唐时期佛教述论

鲁统彦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隋唐时期,山东地区佛教发展到鼎盛阶段。不但寺院兴盛,造像众多,而且佛教宗派传播广泛。山东成为全国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山东佛教在当时的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 山东;隋唐;寺院;石窟造像;宗派

中图分类号: B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51(2009)05-0100-05

收稿日期:2009-08-22

作者简介:鲁统彦(1969—),男,山东莒南人,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隋唐史研究。

隋唐时期,地处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佛教非常兴盛,修建寺院、弘扬佛法、开窟造像等活动空前活跃。以往关于山东隋唐时期佛教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石窟造像的调查研究和重要寺院的研究考证,如阎文儒《云门山与驼山》^[1],张总、郑岩《山东东平理明窟摩崖造像》^[2],徐杰舜《灵岩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范例》^[3],宿白《龙兴寺沿革——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二》^[4]及王华庆、庄明军《青州龙兴寺考略》^[5]等。

但迄今为止,尚缺少对山东隋唐时期佛教总体发展情况的研究。本文试从寺院、石窟造像、佛教宗派三个方面,对山东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状况,做一简要分析论述。

一、寺院

寺院是佛教信仰的重要要素,寺院的有无及数量的多少,能够集中反映一个地区佛教活动的兴盛与否,该地信徒的多少及经济实力的大小,以及该地的民众对于佛教信仰的程度。因为寺院的数量是与僧人的数量相关的,寺院的修建及香火也都需要当地民众的供给。

隋唐时期,统治者非常尊崇并大肆利用佛教。仅唐王朝令全国诸州大规模普建寺院的活动,就有三次。统治阶级的佞佛,使得全国各地的寺院非常兴盛,寺院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唐初,一些寺院就占有大量的田产。少林寺因为俘虏王世充的侄子王仁则献给李世民,获得“赐地四十顷,水碾一具”^[6](卷七七《少林寺碑》)。显庆元年(656)秋长安西明寺建成后,高宗下令“赐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布二千匹。”^[7](卷二五七《唐长安西明寺塔碑》)肃宗至德二年(757),唐玄宗避乱于益州时,赐给了大圣慈寺田产一千亩^[8](卷四二)。各地的寺院也趁机大肆兼并,“广占田地及水碾碓,侵损百姓”^[7](卷一九《申劾礼俗教》)。唐朝后期,一座普通的寺院庄园可占地数十顷,大的庄园竟达数百顷。在这种背景下,山东地区的许多寺院也有了很大发展,甚至有的寺院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

淄州长白山醴泉寺规模也很大。此寺拥有十五所庄园,并拥有果园。寺内的琉璃殿,富丽堂皇,“户柱阶砌,皆用碧石构作,宝幡奇彩,铺列殿里。”此寺最盛的时候有百余僧人。

青州城内的龙兴寺是当时一所重要的寺院。它是在前代寺院的基础上改建或扩建而成的。北齐时称南阳寺,当时规模已相当宏大,寺内既有多层的佛塔,又有雄伟壮丽的大佛殿。武周时于此设立大云寺,玄宗又改为龙兴寺,这些改建或扩建显然皆非出于偶然。天宝九载(750)北海郡所铸的龙兴寺铜钟,“高可七尺,螭纽,口径三尺,无翅,翠色欲滴,叩之声甚清越。”^[10](卷一《唐龙兴寺钟铭》)开成四年(840),日僧圆仁到青州时,就被安置在青州龙兴寺新罗院。他对龙兴寺有如下记载:“龙兴寺在该州城内,有僧人50余人,常接待过往行人。”^[9](卷二)当时距龙兴寺的设立,已有百余年,这充分表明盛唐时期该寺之兴盛。

山东隋唐时期最为兴盛的寺院,当属齐州地区的神通寺和灵岩寺。神通寺,古称朗公寺,其创始人竺僧朗,亦称朗公,是佛图澄的高徒。皇始元年(351),朗公来到泰山一带活动,并在前秦统治者的支持下,“创筑房室,制穷山美,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11](卷五《竺僧朗传》)}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朗公寺。由于僧朗弘法“孜孜训诱,劳不告倦”,在当时影响很大。后苻坚沙汰众僧时乃别诏曰:“朗法师戒德冰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南燕的建立者慕容德,也钦佩僧朗的德行,“假号东齐王,给以两县租税。”^{[11](卷五《竺僧朗传》)}由于统治者的尊崇,加上民众的爱戴,朗公寺“威声振远,天下知闻”^{[12](卷一三)}。当时,该寺中有高丽、相国、胡国、女国、吴国、昆仑、北代七国送的金铜像。朗公寺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的佛教中心,可谓盛极一时。在北周建德三年(574)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中,朗公寺同其它寺院一样,遭到洗劫而一度荒废。

隋朝建立后,统治者对佛教采取大力扶持的政策,朗公寺又获得了发展。开皇三年(583),“文帝以通征屡感故,改曰神通也。”^{[13](卷一〇《隋西京胜光道场释法瓚传》)}开皇十四年(594),文帝敕令杨广之子河南王为神通寺檀越,神通寺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后来仁寿置塔,文帝又敕令高僧法瓚送舍利于神通寺,并以法瓚为该寺住持。现存的四门塔,便是仁寿年间(601-604)往神通寺奉送舍利所建之塔。由于统治者的扶持,神通寺也有了相当的规模,以致“上下诸院十有余所,长廊延袤千有余间。”^{[13](卷一〇《隋西京胜光道场释法瓚传》)}

唐代,神通寺又顺时应势,大规模地建塔造像,发展到了鼎盛阶段。据《续高僧传》卷一〇记载:“寺立以来四百余载,佛像鲜莹色如新造,众禽不践,于今俨然。古号为‘朗公寺’,以‘其感灵即目’故,天下崇焉。”唐朝后期,佛教日趋衰落,神通寺也逐渐衰败,在唐末社会大动乱中,神通寺大殿被毁坏。但是,从神通寺周围现存的四门塔、龙虎塔、千佛崖造像以及附近的涌泉庵、九塔寺等遗迹遗址,可以想见唐朝盛极一时的神通寺的庞大规模。

山东隋唐时期最负盛名的寺院,当属泰山西北灵岩山之阳的灵岩寺。灵岩山,又名方山、玉符山,僧朗于昆仑山降锡时曾来此说法,猛兽归伏,乱石点头,故又称灵岩山。“苻秦永兴(357-384)中,竺僧朗卜居于此,始建精舍数十区”^[14],此即灵岩寺之创始。苻坚为“重其人而神其地”,还赐方山名为昆仑山金舆谷。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太武帝推行了灭佛行动,灵岩寺未能幸免于难,不仅被革除昆仑金舆之名,恢复方山的旧称,而且寺院全部被毁,“前之精舍,鞠为茂草矣。”^[14]从这以后,灵岩寺荒废了七十多年。北魏孝明帝正光(520—525)年间,高僧法定“先建寺于方山之阴,曰‘神宝’,后建寺于方山之阳,曰‘灵岩’”^[14],灵岩寺又得以复兴拓建。经过五十年的发展,灵岩寺又成为远近闻名的寺院。北周建德三年(574),在周武帝禁佛行动中,灵岩寺又遭到破坏。但武帝死后,灵岩寺随之复兴。

开皇十五年(595)隋文帝东巡时,专程巡幸灵岩寺。唐朝建立后,灵岩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贞观(627-649)年间,高僧慧崇住持灵岩寺,遂将灵岩寺迁到了现在的御书阁处。由于慧崇的苦心经营,灵岩寺非常兴盛,吸引了各地众多的高僧。据清《灵岩志略》载,贞观初年,著名高僧玄奘曾慕名到灵岩寺译写经文。京师弘福寺的高僧灵润,曾“名厉河北,誉满京师”,听说泰山灵岩寺“僧德肃清,四方是则,乃杖策行焉。既睹副师,遂从谘训,乃习般舟行定。”^{[13](卷一五《唐京师弘福寺释灵润传》)}麟德二年(665)十二月,唐高宗与皇后武则天到泰山封禅,也曾率领兵马几千人驻跸灵岩十天之久。灵岩寺进一步发展到鼎盛时期,此时的灵岩寺,影响已经超过神通寺,成了全国很有影响的名刹。元和年间(806-820),“唐相李吉甫纂《十道图》,以润之栖霞,台之国清,荆之玉泉,合兹寺为四绝”^[14],灵岩寺更负有“四绝第一”的盛名。

盛唐时的灵岩寺规模庞大,势力雄厚。据《续高僧传》卷十五载,在京师弘福寺高僧灵润来灵岩寺习法时,就有僧侣五百余人。据金党怀英《灵岩寺记》载,“(灵岩寺)历隋至宋,土木丹绘之工,日增月葺,庄严为天下冠。四方礼谒,委金帛以祈福也,岁无虑千万人。佛事益兴,而居者益众,分而为院者三十有六。”它的疆界,“西起鸡鸣山,东至棋子岭,南起明孔山,北至神宝寺。境东西二十里,南北十里。”^[14]它的规模已远超神通寺,无愧于“四绝第一”的美誉。

但安史之乱以后,山东地区的寺院逐渐衰落。这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较具体的描述。如莱州龙兴寺,“佛殿前有十三级砖塔,基阶颓坏,周廊破落。寺无众僧,仅有二僧,寺主、典座。”连一向兴盛的淄州长白山醴泉寺,也是“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陵迟,无人修治。”^{[9](卷二)}

会昌五年(845),唐武宗采取了大规模的毁佛行动,连续下达了极为严厉的灭佛诏令。经此巨变之

后,规模盛大、僧徒众多的大型寺院所剩无几,规模较小的寺院也都毁坏殆尽。灵岩寺遭到空前的浩劫,仅证盟功德龕造像得以幸存,寺院再度荒废。登州“虽是边北,条流僧尼,毁拆寺舍,焚经毁像,收检寺物,共京城无异。”^{[9](卷四)}就连香火一直非常旺盛的赤山法华院也被夷为平地,当圆仁于会昌五年九月再次来到赤山新罗村时,已经无寺可居。这说明山东地区新罗侨民社区的佛教寺院,也未能幸免于佛难。

但政府的灭佛令,在一些割据的藩镇并没有得到认真推行,“唯黄河以北,镇、幽、魏、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佛寺,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9](卷四)}青、齐地区仍处于半独立状态,破坏应当比京、洛等地要轻一些。会昌六年(846)唐武宗死后,继位的唐宣宗立即废除了毁佛法令。于是山东各地被毁的寺庙,得以重新修葺,恢复活动。大中五年(851),灵岩寺住持从新上书朝廷,获准重修灵岩寺,灵岩寺很快又得以恢复和发展。此后,灵岩寺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因此仅五、六年的毁佛行动,对青、齐地区的佛教势力影响不是太大,灵岩寺等佛教基地也就与唐一代相始终。

二、石窟及摩崖造像

石窟和摩崖造像,是佛教在我国产生、传播的产物,是佛教活动的重要遗迹。山东地区是我国东部沿海保存古代石窟造像最多、最集中的地区。经过调查发现,隋唐时期的石窟和摩崖造像主要分布在齐州、青州、郛州、兖州等四个地区,如齐州的玉函山、佛峪、神通寺千佛崖,青州的云门山、驼山,东平的白佛山、理明窝、司里山,曲阜的九龙山等。这些主要的石窟造像,从一些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山东地区佛教传播的情况。

隋朝建立后,由于文帝和炀帝的大力提倡,佛教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开窟造像活动也逐渐兴盛起来。一些王公贵族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山东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开凿了大量的石窟造像。为了祈福消灾,众多的庶民百姓也纷纷出资造像。唐代,佛教达到了鼎盛时期,石窟造像的开凿也达到了高潮。山东地区的开窟造像活动,也比以前更加普遍,造像的数量显著增加,分布范围也更广。唐中期以后,佛教势力仍然笼罩着整个社会。但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陷入了长期的割据混战中。地处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间,待尽沟壑。”^{[15](卷二五二)}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开窟造像主体的广大僧侣民众,就无心也无力开窟造像了。因而,山东地区的造像活动大大减少。

这一时期山东地区造像的发展及其衰落,从造像题记中可得到充分的证明。据不完全统计,在山东各地的造像题记中,唐代纪年明确的共有 112 条,前期为 104 条。其中高宗时期 13 条,武则天时期 13 条,而开元、天宝时期则有 68 条之多,占纪年明确题记的 60%以上。可见,唐前期特别是开元、天宝时期,山东地区开窟造像的兴盛。而唐后期,唐代纪年明确的题记仅有 8 条,这是山东地区经济的衰败在佛教信仰方面的具体反映。

通过造像题记,我们又可以看出供养人的身份地位及其经济实力,并可进一步分析各地佛教信仰的程度。从山东造像集中的几个地区来看,在造像供养人方面存在着一些较明显的差异。

齐州的治所济南,号称历下名城,唐代已经非常繁华,成了山东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较隋代进一步上升,“至于山川沃野,衿带形胜,天下名州,不能过此。”^{[16](卷一)}因而,这里成了山东地区造像最为集中的地区。就造像者的身份来说,齐州地区非常广泛复杂。既有皇亲贵族等上层人物,又有地方官吏;既有僧侣,又有众多的普通百姓。由于皇亲贵族财力雄厚,因此这一时期齐州地区造像的龕窟,比北魏和隋朝时期都要大,造像也更高大。而且,造像都很丰满,气度庄严而大方,显示了皇家的气派。普通的僧侣及百姓,由于财力有限,所造的龕窟都比较小。造像供养人身份的复杂,以及与以往不同的造像目的,都说明齐州地区佛教的信仰比以往更为普及。

青州地区的造像供养人中,既没有皇亲贵族,也没有隋朝青州总管、总管府长史等身份较高的地方长官。但是,造像供养人的身份也很复杂,既有益都县令等地方中下级官吏,又有都僧盖等僧侣上层人物,还有圆满等普通僧尼,更有李怀膺等许多普通的百姓。可见,青州地区的石窟造像是由地方中下级官吏和僧侣上层联合发起,普通僧侣、众多百姓参与开凿的。虽然保持了隋代佛教发展的势头,但由于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转移,青州已经失去了隋朝时期作为山东地区佛教中心的地位。

郓州东平地区在唐代一度成为南北交通要冲,尤其贞元年间,须昌城一度成为天平军节度使、郓州、东平郡、东平县四级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所在,发展成为相当规模的城市。^[17]因而,这一地区在唐代也出现了众多的石窟造像群,龕窟、佛像的数量也很多。只是龕窟的规模总体而言较齐州、青州地区要小,更多的则是摩崖造像。就造像者的身份来看,东平地区没有齐州和青州那么复杂。除了有地方中下级官吏外,大多为普通百姓,没有发现僧侣的造像。可见,东平地区造像供养人的主体应为普通百姓,也有个别的地方中下级官吏。

曲阜地区的造像题记,也大多磨灭不可辨识。但是,从仅存的两则题记可以看出,造像者“宋五娘”及“□县人□相”应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宋五娘”造像的目的是为亡父祈福。从供养人及其造像的目的来看,这一地区佛教信仰普及的程度,远不如青州、齐州及郓州东平地区,这可能是受到儒教排斥的缘故。

三、佛教宗派

隋唐时期,由于高僧的大力宣扬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一些主要的佛教宗派,如净土宗、禅宗和法华宗等,在山东地区也广泛地传播开来。石窟和摩崖造像,作为佛教活动的重要遗迹,佛教宗派必然会在其中有所反映。

净土宗在齐州、青州及郓州等地区,非常流行。净土信仰在东晋时期已较普及。由于修行方法简单,加上净土大师的大力弘扬,唐初传播更为广泛。著名的净土宗大师善导,“造弥陀经十万余卷,画净土变相三百余壁。满长安中,并从其化。有终身诵弥陀经十万至三五十万卷,日课佛名一万至十万声者。”^{”[8](卷三九)}齐州的著名高僧大行,曾修行于泰山,专心念阿弥陀佛。相传他“行法华三昧,感普贤现身”,“后时诏行入内宫,寝於御殿,敕赐号常精进菩萨,受开国公。”^{”[18](卷二四《唐兖州泰山大行传》)}

由于净土宗提倡大修功德,起塔立像,为了往生西方净土,人们都不惜财力地“敬造阿弥陀佛”。因而,阿弥陀佛成了山东地区造像的主要题材,较之前数量显著增多,在各种造像题材中数量也最多。青州、齐州、郓州地区,都盛行造弥陀佛像。尤其是东平理明窟,弥陀佛成了最重要的造像题材,这里还是古弥陀院所在,净土宗非常盛行。

弥勒是弥勒净土的教主,与弥陀佛同为净土信仰所崇拜的对象,是佛教所说的将继承释迦牟尼之后于人间成佛的菩萨,是大乘佛教所说的未来佛之一。北朝时期,弥勒信仰在山东地区就非常流行。^[19]因为当时战乱频繁,人们就很容易把对未来的美好愿望与弥勒降生后的佛国联系在一起。唐初,因为玄奘信仰弥勒净土,弥勒信仰颇盛一时。^{[13](卷四《玄奘传》)}武则天即位后,自诩为弥勒下生,弥勒造像一度在全国非常盛行。齐州、郓州地区的石窟造像中,都有弥勒佛像。可见,隋唐时期弥勒信仰在山东地区仍有重要的影响。

禅宗主要流行于齐、兖泰岳地区及棣州、沧州地区。从开元年间(713-741),灵岩寺一直是禅宗北宗的弘法中心。北宗神秀的弟子降魔禅师曾受神秀之命,在泰山灵岩寺讲经说法达数年之久,有“金輿谷朗公行化之亚”^{”[18](卷三《唐兖州东岳降魔禅师传》)}的美称。灵岩寺一时高僧云集,非常兴盛。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因禅宗盛行,坐禅之人“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此前饮茶仅流行于江南产茶区,由于灵岩寺禅宗北宗的兴盛,使得饮茶之风俗风靡北方。

禅宗北宗衰落以后,泰岳地区又成了南宗讲经说法的重地。南宗大师马祖道一的弟子怀晖,就曾修行于泰山灵岩寺。会昌灭佛以后,北方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寺院被毁坏,僧众被遣散,经典也被焚毁,各宗派日趋衰落。但这种情形对禅宗影响较小,因为他们散处在山林,自己解决衣食,也不重视经典。而且由于禅宗能够接近平民,吸引了广大在战乱中丧失土地的农民,因此唯独南宗比较盛行。大中八年(854),比丘义玄于河北镇州建立了临济禅院,大行禅法,形成了临济宗。山东地区离镇州不远,受其影响很大。齐州的灵岩寺和兴国寺,都是著名的临济宗禅院。

隋唐时期,法华宗在登州地区的流传也很广泛。登州赤山的法华院,是当时一所著名的法华宗寺院。该寺长年讲经,“冬诵法华经,夏讲八卷金光明经。”^{”[20](卷九《妙法莲华经》)}每年从十月十六日起,至来年正月十五日止,寺中都举行隆重的“法华会”,其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讲《法华经》。在此期间,四方众僧与有

缘的施主皆来聚会,白日听讲,晚间礼忏。开成四年(839)十一月,日僧圆仁就曾亲临该寺院新罗高僧的讲经仪式。法华宗的兴盛,在石窟造像中也有所体现。东平白佛山石窟造像中有十六王子像,而十六王子的题材出自天台宗的主要经典《法华经》。另据《民国二十五年重修莒志》卷五一“金石志”记载,沂水有永徽二年“十六王子造像题名”。登州赤山法华院的兴盛,及十六王子造像题材的出现,都印证了法华宗在山东地区的流传。

另外,融合各主要佛教宗派的观音信仰,在齐州、青州等地也非常流行。山东地区早在北朝时期,观音信仰就已经很流行。^[19]按照佛经的宣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能应一切众生的愿望,把他们从各种苦难中解救出来。观音菩萨比佛祖更贴近百姓,贴近现实,因此就很自然地成为人们信仰的主要对象。隋唐时期,由于密宗、法华宗及禅宗的宣传,观音信仰更加兴盛。这从山东各地区的石窟造像中,也能反映出来。这一时期青州、齐州和兖州曲阜地区的石窟造像中,都有菩萨和观音造像。观音造像的数量,也比阿弥陀和弥勒之外的其它题材多。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菩萨就是观音菩萨的代名词。因此在百姓的心目中,观音的地位几乎已经和佛祖平起平坐了,菩萨甚至比佛祖受到了百姓更广泛的信仰。

综上所述,从寺院的兴盛、石窟造像的开凿以及佛教宗派的传播来看,山东隋唐时期的佛教非常兴盛,成为全国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山东隋唐时期的佛教,在全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阎文儒.云门山与驼山[J].文物参考资料,1957,(10).
- [2]张总,郑岩.山东东平理明窟摩崖造像[J].文物,1998,(08).
- [3]徐杰舜.灵岩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范例[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05).
- [4]宿白.龙兴寺沿革——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二[J].文物,1999,(09).
- [5]王华庆,庄明军.青州龙兴寺考略[J].中国文物报,1998.10.14(3).
- [6]王昶.金石萃编[M].北京:中国书店,1985.
- [7]董诰,等.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8]志槃.佛祖统纪[M].大正藏本.
- [9]圆仁,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0]段松苓.益都金石记[M].清光绪九年刻本.
- [11]释慧皎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2]道世.法苑珠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13]道宣.续高僧传[M].大正藏本.
- [14]马大相.灵岩志[M].清刻本.
- [1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16]段成式.酉阳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7]吴绪刚.胜迹遍东原——山东东平文物述略.文物天地[J].1996,(06).
- [18]赞宁,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9]刘凤君.山东省北朝观世音和弥勒造像考[J].文史哲,1994,(02).
- [20]大正藏刊行会.大正藏[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83.

The Discussion On Buddhism of Shandong Area in Sui And Tang Dynasty

LU Tong-yan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 Developmen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Buddhism of Shandong ran to crest phase in Sui and Tang Dynasty, fanes were at the height of power and splendour, statues were throng, and Buddhism sects spread abroad. Shandong area became one of the countrywide Buddhism focus, Buddhism of Shandong was possessed of important status in Sui and Tang Dynasty.

Key words: Shandong; Sui and Tang Dynasty; Fane; Status; Sect

责任编辑:左桂秋